

人的异化与文学的发现——再读《人的文学》和《论“文学是人学”》

[作者] 胡鹏林

[单位]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和钱谷融先生分别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文学中人的发现问题。他们指出人的本质和文学的本质及其关系,但是对人的异化状态没有作出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认为,美是显现人的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文学艺术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自由创造的审美关系的最集中的体现,因此超越人的异化状态,达到人的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 人的本质,异化,文学的发现,实践美学

文学是发现人类的真善美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有史以来最深入人心的精神享受。我们说,文学是以语言为表现方式,以情感来打动人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而作品之所以能以情感来打动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作家强烈的表现欲望和表现能力,更是因为这种情感是基于人性的。只有在人性的层面上,人们才能通过文学增进情感的享受和交流。因此,在重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之后,对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文学与人的本质及其关系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

人的本质与文学

周作人在谈人的文学时,首先界定了人。他说:“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的‘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1](P32)这里提到的人的本质问题,他认为人首先是从动物中分化出来的,是区别于动物的但又必须以动物性的生存为基础,是摆脱了动物性的更高级别的生物体;其次,人是不断进化的,在内在生活方面,“比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改造生活的力量。……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同上)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概括得过于抽象,马克思有更为精辟地论述,对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问题作出了全面地考察。马克思首先指出对人研究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不是像周作人那样从人的类本质出发。“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2](P121)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种极端主观化的思想,他认为黑格尔把人与自我意识等同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自我意识通过自己外化所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这种物性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歪曲,它“对我们的意识说来绝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这个被设定的东西并不证实自己,而只是证实设定这一行动,这一行动在一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使它成为具有独立的、现实的本质的作用——但仍然只是在一瞬间”。[2](P123)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就是非存在物,而黑格尔所提及的自我意识的设定,没有证实自己的存在性,只是证实了“设定”这一行为方式的存在性;人的本质的存在必须要“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2](P124)由此可见,人的本质不仅要“去自我意识化”,还要“去抽象化”,而周作人在没有明确地分清自我意识与人的本质问题的条件下,就抽象地提出的人的本质,那么这个“人”的文学的前提就出现谬误。

其次,周作人在抽象地界定人的本质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性的二元统一性。他认为“肉

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种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就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1](P32-33)虽然他对人性善(神性)恶(兽性)有一定认识，并企图融合两者，但他一方面抽象地分离两者，同时又认为两者合起来就是人性，这就完全抛开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在人的这一本质基础上，我们可以返观文学的现实审美关系问题。在周作人看来，人性是抽象的，是兽性与神性的合一，因此人的文学也必然只是反映这种抽象的人性，因此他的人道主义也只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且永恒的人性也是不存在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4](P175)而就文学来说，它要在那个时期里打动读者，就必须与当时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相适应，文学也因此与人性的发展同步。[5](P15-26)

然而，周作人的人性观念是一种个人本位主义，忽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他还就此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因为人就像森林中一棵树木，森林茂盛了，树木就会茂盛，但是要使森林茂盛，就必须要靠各树各自的茂盛。其着眼点在于个体。二是个人爱人类，是因为人类中有了我，我才是我爱人类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我看来，他这种以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来研究文学，不是真正的人的文学，只是畸形的文学形态。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的同时又遭受到巨大的压抑，张扬的一面就是周作人在此强调的个人主义，压抑的一面就是如马克思所论及的人的“异化”状态。人的“异化”包括四个方面：人与劳动产品、人与劳动活动、人与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性的这些异化状态在文学中往往表现出压抑、颓废、虚无等反人性的主题，如贝克特《等待戈多》中荒谬绝伦的等待，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体现的历史虚无感，都使我们感到世界的荒诞甚至末日的来临。马克思由此提出理想的人性观，即对动物性和非人性的否定，是对人的个性或主体性的肯定，是人的类特性在人的道德精神中表现出来的有利于个人发展的一系列优秀品质和完美特性。

实质上，人性是由生产劳动即人的本质决定的并反映在人的社会性上，而人的个性是反映人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离开社会和社会关系，人的个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理论依据，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为有个性的存在，“个性发展程度依赖于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与交往形式的占有程度以及占有方式”。[6](P246)因此，人性和人的个性发展是与社会及其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在这种社会语境中来研究文学，才更清晰地显现文学与人的本质以及人性的关系：文学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性在社会关系中最自由地显现，它着眼于人类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文学的各种样式只是表现、创造并实现这一自由的方式。波兰人文学派的代表沙夫认为自由有三种涵义：“一，一个人当他的行为意志不受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所决定时，他是自由的；二，一个人当他的活动不受任何社会生活或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所支配时，他是自由的；三，一个人当他能够在几种不同的行为路线中任意选择一种时，他是自由的。”[7](P74)这里他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关于人的类本性的自由、人从外部世界解放出来的自由、人支配自身的自由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释。这种自由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即是三个方面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自由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即自由是对功利目的的超越；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即自由是人在社会中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人(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着双向对象化——主体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主体化，[8](P71-76)即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在对象世界中，使自然人化，而自然的本质规律内化在人的意识中成为人的内在尺度，使人也人化(主体被对象化)；因此人在利用自然规律时就逐渐达到了实践的某种自由程度，在这种自由状态中，人与自然、社会发生了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的产生过程也可以称为从

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这种审美关系体现在对象世界上就是美,体现在主体的人身上就是美感,美与美感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实践中使审美关系形成相对集中和纯粹的表现形式,即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与人类的自由创造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学艺术中的超越性也体现在这里,即文学艺术使社会实践更加自由,使人类的生存更加自由、审美化、艺术化,从而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走向人类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理想,也是共产主义关于人类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理想。文学艺术正是遵循着这一审美规律,并在实现人的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全面的发展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的审美理想。后文在文学与实践中的审美关系的形成等问题的阐释中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文学发现了人

文学的对象和题材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而且其描写人也不仅仅是文学一种手段和工具,更是文学的落脚点。正如钱谷融所说:“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的描写,是绝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是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9](P3)人不是文学中的形式层面的表现物,如果把人仅仅作为这样一种工具或手段,人就成为了一种抽象的符号或概念,只是在能指与所指之间转换——能指在这里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所指也就是抽象的文化意义,而抛开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本体存在。人的存在是多方面的,马克思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自然存在、类存在、社会存在和个性存在。“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人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是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P52-54)同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的个性并不消融于社会关系之中,人的这四个方面具体地存在才是产生美的根本所在,美的规律是在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中产生。因此,人是文学中更深层次的内容层面,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实践的而非意识的。

在文学中,我们可以揭开异化存在状态的面纱,发现真正的人的存在并使这一存在更加自由。首先在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反映论者认为文学是为了反映社会现实,也就是揭示社会存在的本质,而把人作为这一反映过程中的工具和附属物。这是极端片面的观点,人并不是绝对地从属于社会存在的,相反,“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9](P7)人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不是对立或从属的关系。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出现了异化状态,亦即客体对主体的异己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我们在文学中往往习惯于把揭示这种制度的黑暗和不平等作为目标,也就是在于反映这一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性;事实上,文学并不是一门关注这种社会存在的社会学科,而是关注人的存在以及怎样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文学科。如果仅仅把文学艺术的任务局限于反映社会存在这一点上,那也就否定了文学艺术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文学艺术作为特殊的精神活动和审美活动的独特性。只有把握这种独特性,“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9](P21)拨开异化劳动的迷雾,从文学中寻找出人的真正自由的存在状态。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文学中似乎不可能具备这种只有共产主义才有的自由状态;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作品同样是伟大的作品,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类本质和人的本性,同样是对自由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是指向如马克思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中的人的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和谐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0](P669)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性都是不断发展的“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种人性是不断地趋向于“人的一般本性”，文学就是不断地发现人的一般本性并逐渐丰富其本性的有效方式；但是要达到人的最一般的本性——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全面的发展——这一本性的体现也就是真正的美，而文学恰好是审美的，是表现这种最一般的本性的。因此，我们在文学中能够透过异化的表象，发现真正的美和人类最一般的本性。

周作人和钱谷融两位先生在谈到文学的评价标准时，都提到了人道主义精神这一范畴。钱先生认为自古以来的文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珍爱，关键就在于“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9](P2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人道主义作为最低评价标准，把人民性作为最高标准。事实上，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都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形式而已，并不能涵盖整个人道主义的，否则“李后主的词，王维、孟浩然以及许多别的诗人的许多诗篇，就只能被排除在古典作品之外”。[9](P25)关于人道主义，在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中表现出来的是“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其根本主张在于“人的现实的对象化”、“通过消灭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2](P131)而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的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是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它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P77)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指向这样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人的个体存在、类存在与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之间和谐共处，人性也不再处于异化状态，人的本质在现实的生存条件中实现，人也最终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到达审美的世界。

文学与实践

审美特性是文学的基本特性。美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基础上，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所取得的必然的历史成果，这也是我所坚持的实践美学观。[11](P6)因此在我看来，文学艺术的第一基础就是实践。首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原因即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使人的生命存在得到保障，只有在生物性的存在基础上才能引起其他的新的需要，这才是人类历史开始的标志。“动物和它的生命是直接同一的。它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2](P53)正因为如此，人才能对象性的存在，才意识到自己是类存在物，人自身及其生活对他自己来说是对象，因此人才所以成其为人并获得自由的发展。其次，人不仅仅只是存在或有意识的进行实践，更重要的在于创造或改造世界，“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是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P53-54)可见人的实践是一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实践使人从动物性中摆脱出来，并进入到人的更高状态——“按照美的规律”从事社会实践。在改造世界的能动的类生活中，人证明了自己是类存在物，自然界甚至社会才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54)只有通过对象化的劳动实践，人类

才有了用于社会交流意识和话语，才有了政治、经济、道德、宗教以及一切形而上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虽然生产实践可以把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并划分出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但是这并没有抓住人的独特本质。因为实践是具体的、有序的，而不是抽象的、混沌的，它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社会特质。马克思把它定义为生产方式，即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也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表现自身及其生活。因此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现实的个人，制约着个人的全部生活和社会交往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人的具体的历史的本质。

文学艺术的第二基础就是对象化劳动的自由、生产的自由、生产方式的自由，以及由此达到人的最充分的自由。而其根本就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即“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因此是生活的乐趣”[2](P172)正是这种自由和乐趣促使人们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审美关系，文学从而也可以区别于其他的活动而显示出其审美活动的独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有精辟地论述：“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2](P455)，“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陋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P83)，“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3](P7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三个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自由地认识和利用规律；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即自由地超越功利目的；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即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

在自由的实现过程中，人与自然社会形成了审美关系，美、美感和文学艺术也随之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控制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4](P926-927)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实践的创造活动，不单使人在自然界中独立出来，更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而人由于自身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感性的和理性的本质力量脱离了动物界而成为真正的人和人化的人。所以在创造本身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的时候，人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之间就产生了审美关系。在这种审美关系中，对象世界的形象表现出了美，亦即显现了人的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15]而人在现实世界中感应这种自由的形象及其肯定价值的时候，就会产生美感。审美对象的美的肯定价值只有对审美主体的美感才有意义，“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不是对象，不是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同时，审美主体的美感又是由审美对象的美的肯定价值所引起的，“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因此，审美客体的美的肯定价值与审美主体的美感是在社会历史中相对应地产生和发展。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又在实践的基础上自由地创造审美主客体的审美关系的最集中的体现，即各

种文学艺术形式。各种文学艺术形式联系着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以及产生主客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形式,所以表现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不再局限于必然王国的有限自由,而是使人类及其生活达到充分的自由并不断向自由王国飞跃;在自由王国中,文学艺术使人的生命存在自由化、审美化,最终达到人的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全面的发展。

注释

[1] 周作人《人的文学》,选自唐金海等编《新文学里程碑·评论卷》,文汇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

[2]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5]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这部文学史基本是采取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同步的观点,认为只要文学作品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人性,也就越能与读者产生情感沟通并成为伟大的作品。这种文学史观超越了传统的阶级的意识形态。

[6] 韩庆祥《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

[7] 沙夫《人的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5 月。

[8] 参见拙文《主体的对象化与对象的主体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

[9]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1]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5 月。实践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形态,刘纲纪先生是这一美学形态的发端者之一,他始终坚守实践的观点,可参见其文《实践本体论》(《武汉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当代美学问题》(《光明日报》1998 年 10 月 23 日)等。

[12]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5] “美是显现人的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是张玉能先生提出的观点,对此我基本同意。但是在后现代转向中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在与后实践美学的论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冲击下,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虽然有其相对全面性,但是如何推进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语言理论与自由的实践的关系理论及其对艺术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仍然是当务之急。

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28